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10 年 1 月（总第十七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10. 1 —

E-mail: ias-fudan@fudan.edu.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目 录

一.学术成果	3
1. Fudan Journal 12 月卷出版.....	3
2. 乔治·萨拜因著 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下卷.....	4
二.学术讲座	9
1. 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十三期“通业青年讲坛”.....	9
2.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三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13
3.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二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20
4. 马戎教授主讲“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22
5. 复旦高研院“奉贤通识系列讲座”顺利开讲一学期.....	25
三.媒体报道	29
1. 学术研究的新典范——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29

一. 学术成果

1. Fudan Journal 112 月卷出版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 Quarterly

Volume 2 Number 4 December 2009



Contents

Special Topic: China Studies

1 The Sino-US Relations and Alliance Structures in
Northeast Asia

Shen Ding-li

28 An Advocacy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RB Countries

Yin Xing-min

54 Can Democracy Save China's Environment?

Zheng Shi-ping

83 Action on Ageing in China: A Multi-Perspective Analysis

Jing Yi-jia

104 Collecting and Collecti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 Robert Morrison's
Dictionary

Si Jia

Articles

123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and the Semantic Make-up of the Chinese
B•-construction

Zhang Ning-ning

Book Reviews

150 He Jun-fang,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by Naran Bilik

159 Zhou Bao-hua, *Effects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Ideas of Media Audience
Relationship*

by Shen Guo-lin

164 Jack Linchuan Qiu,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by Deng Jian-guo

169 Sun De-gang, *Multi-facet Balancing and a "Quasi-Alliance" Theory*

by Wu Cheng-qiu

172 **New Books**

Within the Academe

175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RIETHEH at Fudan University Held in
Changxing, Zhejiang

Xi Tian-yang

目 录

中国学研究专题

- 1 中美关系与东北亚同盟结构 / 沈丁力
28 中国与大湄公河流域贸易自由化的倡议 / 殷醒民
54 民主能否拯救中国的环境 / 郑世平
83 中国的老龄行动：一个多角度的分析 / 敬义嘉
104 汇字与字汇：马礼逊《字典》中的中国地方文化 / 司徒佳

其他文章

- 123 汉语“把”字句的构式意义与语义构成 / 张宁宁

书评

- 150 中国语言人类学的突破与局限——评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 纳日碧力戈
159 我们为何如此关心媒体效应——评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 沈国麟
164 数字鸿沟飞渡，知识差距依旧——评《劳动阶级网络社会：中国城市中的传播技术和信息贫穷者》/ 邓建国
169 理论与历史的结合——评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 吴澄秋

172 书讯

学术通讯

- 175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创立会议在浙江长兴召开 / 席天扬
179 作者简介

2. 乔治·萨拜因著 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下卷

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下卷，【美】乔治·萨拜因著，【美】托马斯·索尔森 修订，邓正来 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目录

第三编 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1

第十八章 马基雅维利.....3

现代专制制度.....5

意大利和教皇.....8

马基雅维利关注的问题.....11



道德上的冷漠.....	12
普世的利己主义.....	15
万能的立法者.....	18
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	21
洞见与缺陷.....	25
第十九章 早期的新教改革者.....	28
消极服从与抵抗之权.....	30
马丁·路德.....	32
加尔文与消极服从.....	40
约翰·诺克斯.....	43
第二十章 保王派的理论与反保王派的理论.....	46
法国的宗教战争	46
新教徒对专制主义的抨击.....	49
《为反对暴君的自由而辩护》	52
其他新教徒对专制主义的抨击	58
耶稣会会士与教皇的间接权利	60
耶稣会会士与反抗的权利	63
国王的神授权力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66
詹姆士一世.....	70
第二十一章 让·博丹	75
宗教宽容	76
国家和家庭	78
主权.....	81
对主权的各种限制.....	84
秩序良好的国家.....	87
第二十二章现代化的自然法理论.....	92
阿尔色修斯.....	93
格劳秀斯：自然法.....	97
道德原理与论证.....	103
契约与个人同意.....	107
第二十三章英国：准备内战.....	113
莫尔的《乌托邦》	114
胡克：英国的国教.....	115
天主教和长老会的反对.....	121
独立派教徒.....	123
宗派论者与国家至上论者.....	126
宪政理论：史密斯和培根.....	127

爱德华·柯克爵士.....	130
第二十四章托马斯·霍布斯.....	135
科学唯物主义.....	137
唯物主义和自然法.....	139
自我保护的本能.....	141
理性的自我保护.....	144
主权与拟制的法人.....	148
从拟制的法人做出的若干推论.....	150
国家与教会.....	154
霍布斯的个人主义.....	155
第二十五章激进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158
平均派.....	160
英国人的天赋权利.....	163
温和的改革和激进的改革.....	167
对立法机关的限制.....	170
掘地派.....	172
温斯坦莱的《自由的法律》.....	175
第二十六章共和派：哈林顿、密尔顿和西德尼.....	179
共和政治的经济基础.....	181
法律的绝对统治.....	185
共和国的结构.....	188
约翰·密尔顿.....	192
菲尔默和西德尼.....	196
第二十七章哈利法克斯和洛克.....	202
哈利法克斯.....	204
洛克：个人与社会.....	208
自然的财产权利.....	211
哲学上的含混之处.....	214
契约.....	217
社会和政府.....	220
洛克理论的复杂性.....	223
第二十八章法国：自然法的衰落.....	228
政治哲学在法国的复兴.....	228
洛克受到欢迎.....	231
环境的改变.....	233
孟德斯鸠：社会学与自由.....	237
法与环境.....	240

权利分立.....	244
伏尔泰和公民自由 (civil liberty)	247
爱尔维修: 法国的功利主义.....	249
重农主义者.....	254
霍尔巴赫.....	255
杜尔哥和孔多塞的进步观念.....	258
 第二十九章对社会的再发现: 卢梭	263
对理性的反抗.....	265
作为公民的人.....	268
法律与淳朴生活.....	271
总体意志.....	276
有关自由的矛盾.....	279
卢梭和民族主义.....	283
 第三十章约定与传统: 休谟和柏克	288
休谟: 理性、事实和价值.....	289
摧毁自然法.....	292
情感的逻辑.....	296
柏克: 约定俗成的政体.....	298
议会代表制与政党.....	301
抽象权利与政治人格.....	303
历史的神圣之维.....	306
柏克、卢梭和黑格尔.....	309
 第三十一章黑格尔: 辩证法和民族主义	313
民族精神.....	316
德意志国家.....	320
辩证法和历史的必然.....	324
对辩证法的批判.....	330
个人主义和关于国家的理论.....	336
自由与权威.....	340
国家与市民社会.....	346
黑格尔哲学的日后影响.....	352
 第三十二章自由主义: 哲学激进主义	357
最大幸福原则.....	362
边沁的法律理论.....	367
早期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373
早期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	381
 第三十三章现代化的自由主义	388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自由.....	392
社会研究的诸原则.....	402
赫伯特·斯宾塞.....	407
对自由主义的唯心主义修正.....	411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	420
自由主义的当今意义.....	426
第三十四章马克思和辩证唯物主义.....	440
无产阶级革命.....	441
辩证唯物主义.....	446
经济决定论.....	451
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	456
马克思的总结.....	460
恩格斯论辩证法.....	463
恩格斯论经济决定论.....	468
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	471
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	476
资本主义的崩溃.....	480
社会革命的策略.....	483
第三十五章共产主义.....	490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493
列宁的政党理论.....	497
列宁论辩证唯物主义.....	504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512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	519
革命的途径.....	528
革命的前景.....	534
革命成功后的问题.....	539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541
民主集中制.....	547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550
共产主义在中国.....	561
共产主义的特征.....	569
第三十六章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576
民族社会主义.....	580
普鲁士社会主义.....	584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舆论环境.....	588
哲学是一种神话.....	594
法西斯主义与黑格尔主义.....	598
平民、精英和领袖.....	604

种族的神话.....	610
生存空间.....	617
极权主义.....	623
民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	630
索引.....	637

二. 学术讲座

1. 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十三期“通业青年讲坛”

2010年1月7日(星期四)下午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通业青年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三期学术讨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张双利,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在站博士后、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邱家军,华东师范大学西方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马华灵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点评嘉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担任本次通业青年讲坛的主持人。高研院研究人员沈映涵、刘清平、孙国东、林曦等参加了本次讲坛。许多来自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生和老师也来到了讲坛现场。

首先,邓正来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出席讲坛的讲演嘉宾以及点评嘉宾,对嘉宾和听众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为三位讲演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通业青年讲坛讲演嘉宾聘书。

主讲嘉宾张双利做了题为“建构宗教与革命的联盟——卢卡奇、布洛赫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宗教思想初探”的学术报告。一共涉及到四个大的问题:

第一,张博士对题目做了说明,指出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复活了黑格尔体系的传统,尤其是以总体性为核心的辩证法传统。不过,在这里嘉宾指出自己并未特别把黑格尔思想的维度加入,而是选择关注宗教这一维度,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传过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共同揉入,一个是德国思辨哲学(German 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传统思想资源,另一个是大批犹太人身份的欧洲知识分子具有的宗教方面的思想资源,这一资源连带出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所以



在这里，她特别关注卢卡奇和布洛赫在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宗教方面的思想资源以及这一资源最终为什么会做实成为宗教和革命的联盟。

第二，她讲解了马克思的宗教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从异化批判的角度、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角度对宗教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并将其中严密的逻辑关系和复杂的文本进路展现了出来，重点讲解了究竟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商品拜物教（偶像崇拜）这个概念。

第三，她介绍了卢卡奇、布洛赫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作为欧洲知识分子代表的他们以马克思·韦伯的双重态度和意义上的思想为支撑，各自进行了激进化与创造性转换，其问题意识建基于对欧洲文明危机的基本判断，即指出当下的欧洲文明进入了末世论意义上的危机，具体表现在哲学上的新康德主义，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唯美主义，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日益凸显的犹太人问题等等。

第四，嘉宾分析了宗教和革命的联盟是如何被积极建构起来的这一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思想资源，联盟建构过程还涉及到犹太教弥撒亚主义、基尔凯郭尔（祁克果、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乌托邦思想、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最终落实为革命的伦理等思想资源。



主讲嘉宾邱家军做了题为“层推选举法修改的逻辑”的学术报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他指出自己是以法律的逻辑自洽为研究方法，举了一个例子，即针对我国选举法“四分之一”条款背后的代表制理论（农村公民的被代表权只有城镇公民的四分之一），可以从“国情”和宪法平等权这两个角度进行追问逻辑自洽程度的学术研究。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旨在回答：本次选举法的修改，以城乡按照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制度安排是否更好地实现了公民的真正的行省选举权？能否通过对选举法的修改实现从阶级政治到公民政治的转换？通过选举法的修改能否推进政治民主的实际进程？

第二，他考察了选举法的法律渊源与其中涉及的各类属种关系，辨析了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和选举法，选举法与宪法，宪法与党章及执政党等几组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三，他说明了选举法的修改主体与技术路线，讲解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五年立法规划、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制定或修改某一部法律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议案的审查，全国人大进行投票表决等一系列法律的和政治的实践过程与内容。

第四，他指出在选举法修改中呈现出来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三者之间存在张力，学理上不断被强调的前后一致的逻辑严密性在现实操作中有待加强。

第五，嘉宾强调本次选举法的修改过程与民主政治宏大叙事式的政治发展志向之间存在逻辑矛盾，选举民主的确立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绝非一蹴而就的实践问题。



主讲嘉宾马华灵做了题为“中国启蒙运动与中国知识人的现代转型”的学术报告：第一，他指出自己试图处理的是“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倡导的

启蒙运动为何在乡村社会发生的效力并不明显”这个问题，讲演人极力想发掘其中的社会历史根源。他认为，启蒙要发生效力，前提是知识分子在乡村社会当中居于权威地位，但伴随着中国古代乡村绅士向现代知识人的渐进转型，这一权威地位逐步解体，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到了启蒙的效力不甚明显。

第二，讲演嘉宾着重讲解了古代绅士权威地位的来源和解体，以及解体与启蒙运动的关联这两个问题。前者涉及到权威的知识来源和社会来源两个方面，后者以 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为标志，表现为权威逐步逐代被消解，实际过程是随着知识的正当化、资本化、公共化的土壤丧失，也即是现代知识人在乡村中找不到位置，既形不成有效的知识资本，也做不到充分的知识传播，更未取得足够的知识影响。他指出“重建现代知识分子与乡村社会在知识视野与社会视野上的诸种交集视域，或许是使启蒙在乡村社会更为有效的一个方式。”

第三，嘉宾还谈到，似乎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构成了某种对立，自由民主和白面米饭之间隐约有了某种鸿沟，其中涉及的先在性、独立性和深层次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在嘉宾讲演结束后，与会学者和听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这里摘要列举如下：选举法的实证研究与其后的政治结构和理论预设有何关系？政治过程和仪式是否表达了某种政治合法性，保障了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如何看待强世功等学者进行的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的研究？在讨论权威的知识来源这一问题上的正当化、资本化和公共化等类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中国启蒙运动的不成功和中国知识人权威的丧失有何关系？就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我们有什么启示？选举法本身的合法性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如果把启蒙理解为是对权威的破除的话，那么借助后一种权威来破除前一种权威这一逻辑如何能够自洽？韦伯的宗教理论仅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吗？以政治科学的路径研究政治改革是否可行？等等。讲演嘉宾们对上述问题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回答，大家的讨论非常激烈。

接着，纳日碧力戈教授对本期讲坛做了学术点评，具体针对三位讲演嘉宾的报告，他谈了六点看法：

其一，他指出对启蒙做明确的定义是个重要的问题，康德所强调的启蒙与我们所讲的启蒙是否是一个意思，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无控歧义（uncontrolled equivocation）？是否可能由于语言本身造成了隔阂进而导致人们互相之间的理解总会产生一些偏差呢？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公共的澄清，进而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其二，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启蒙的担当主体呢？知识分子传播启蒙思想的正当性在哪里？思想本身、意识形态、科举考试、普遍认同、公共传播这些都给知识分子权威的确立带来了巨大的力量支持，但目前情况下，这些条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不充足具备了，那么启蒙的真正意义何在？

其三，从哲学层面上看，如果说大道的彰显包含有某些核心的价值理念化育和支撑整个文明样态的话，正义和善的关系隐含有对生存的根基性、合理性问题的追究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提问政治科学的基本理论如何更好地应用到现实当



中，这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富有方法论启发意义的理论问题。因为此一问题的解决在某个角度涉及到了肉体的折磨、物的困扰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光”的显现和大道的澄明这一根本问题？

其四，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断相当详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居于中间的社会文化的研究较多，法兰克福学派对语言问题极为重视，这其中的理论关系还有待厘清。不过，大体上，如张老师所说，犹太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有三类取向，即一种是建立自己国家以保持文化的倾向，另一种是接受同化和放弃原有文化的倾向，最后一种是弥赛亚主义带有的折中性倾向。依照皮尔斯符号三观(semiotic Thirdness)其中的一种分法，物性的象似（它与我们感知的物质世界类似于照片和本人的关系）、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和标指（index，是一种具有折中意味的逻辑关系），这三者合在一起看，是一个同时产生而不断循环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物到抽象，再从抽象到物），这对我们分析“西马”所面对的话语场景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其五，诸位的演讲涉及到语言是否可信的问题，因为大家理解不同、说话的方式不同、用的语言不同，那么我们表达的东西就受到一个马克思所说的物的困扰，实际生活中产生了物的依赖。那么我们所进行着的是靠一种理想去推动的破除，还是我们本能受“心中之光”的指引，抑或是外在和内在的某种结合？一如乔姆斯基所说的人天生有一个语言机制，他成长学习的过程就是把这个机制不断开启，而不是从一个白板开始的学习过程。这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应该有区分。一方面有索绪尔所指出的作为语言系统自身规则的“棋法”问题，是内在定式，另一方面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游戏，是临场发挥。

其六，从张双利博士的讲演可以引发出一个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可以追问革命的理想是什么，这个理想有没有涵盖了宗教的意义和向度？我们是否仅仅是换一种方式在重新解读前人提出的灵与肉、思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等等？同时，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将西方哲学的某些思考引进中国学界，与我们固有的传统思想形成某种在哲学层面上的撞击，这在学术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主持人郭苏建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向到场的所有同道特别是三位讲演嘉宾表示了衷心的感谢，郭教授回顾了八十年代中期学界就开始讨论的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等重要理论问题，希望大家在今后要对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深度研究。



通业青年讲坛每月举办一次，每次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三、四位不同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担任主讲嘉宾，分别做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然后与会人员自由讨论，并由评论嘉宾做学术点评。讲坛旨在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和专业界限，改变学科割裂的、封闭性的研究取向，建立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学科分野的学术交流模式。

2.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三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010年1月10日星期日晚上6:3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第三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本次读书会的阅读文本为:[美]迈克尔·J. 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万俊人等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读书会。

读书会由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沈映涵博士担任主报告人,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和孙国东博士担任主评论人。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及其他校内外的老师与同学参加了此次读书会。

主报告人沈映涵做了题为“自由主义抑或社群主义——评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的发言, 她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论的质疑、上述研究中特别是桑德尔主张的社群主义理论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首先, 主报告人讲述了桑德尔对罗尔斯理论的质疑, 指出桑德尔对罗尔斯所主张的正义的首要性进行了反驳, 他认为正义是一种补救性的美德; 桑德尔对罗尔斯试图通过一种社会契约论的进路来解决正义原则的产生问题这一理论方法提出质疑, 他认为罗尔斯把正当合理性证明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契约或原则何者优先的问题, 在理论结果上回到了罗尔斯本人所刻意避免依靠的先验直觉的认识论; 桑德尔针对罗尔斯的差异原则, 证明了罗尔斯所谓的“道德主体”在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成立。

其次, 主报告人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桑德尔对罗尔斯主张的正义首要性的质疑存在问题, 其所主张的同质化较高的追求善的共同体当中, 各个主体对于相同善的细节方面的观点也可能不同并引起冲突, 正义的存在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 罗尔斯已经通过重叠共识观念的提出, 主张原初状态中主体只能通过某种程度的认同来实现正义的选择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正义首要性这一问题。

再次, 主报告人认为桑德尔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批判即使是有效的, 即桑德尔已然指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实质上是主张实现一种实质主义观念, 这与其在确立正义原则时所依赖的形式正义观念恰恰是相互矛盾的”, 但也并不能证明他对罗尔斯整个道义论自由主义的质疑是有效的, 两者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

复次, 主报告人认为将与罗尔斯同属于道义论自由主义阵营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思想, 特别是他对正义原则适用范围的三个环节的假设——国家、社团(共同体)、个人, 和罗尔斯对于正义优先于各种善的论证结合起来, 或许将开放出一种更加完善的关于正义的道义论自由主义观念。

最后, 主报告人就自由主义理论和社群主义理论中某些可以共通的地方做了说明, 指出“正如阿伦·布坎南所言, ‘在某种意义上, 自由主义政治论题与社群是一种根本的人类善这一论题完全不冲突, 从而并非不一致。’”



主评论人陈润华博士做了题为“‘自由’理论杂谈”的报告。他指出：谈论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和正义，需要首先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有结构性的基本理解。对这一理论研究的语境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西方学者论述公民自由的历史来源。他剖析了柏拉图的神性宇宙观，指出关于自由的根基和正义的界限的讨论与灵魂学说紧密相连，人的不朽接之于神的不朽。自由问题是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并为实践哲学保留了余地：在区分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和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之后。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罗尔斯和桑德尔都有一个契约论的背景，这一点不能被忽视。

主评论人孙国东博士认为，主报告这种面面俱到的论述不仅牺牲了一篇文章所应具有的主题性、逻辑性等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未能真正把握桑德尔写作此书的主要思路和研究路径，它不仅未能很好地把握桑德尔理论的内在理路，也未能把握其相对于罗尔斯的“知识增量”。他认为，桑德尔此书写作的主要特色是采取了他所谓的“批判性建构”的路径，即力图在重构罗尔斯自由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发现其忽视的问题，进而建构一种有别于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共同体主义的理论。这至少表现在：第一，他从“道德主体”或“自我”的角度挑战了罗尔斯“正当（权利）优先于善”的基本命题，同时在否弃罗尔斯“自我”优先于“目的”命题的基础上，论证了正当（权利）及其证明依赖于它们所服务的那些目的的道德重要性，从而论证了“正当内在于善”的命题。第二，他分析了罗尔斯对“差别原则”、德沃金对“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辩护对共同体观念的依赖：要想论证此类行动的正当性要么诉诸于功利主义观念，要么诉诸于共同体观念（即将天赋智商、家境、社会文化机遇等运气因素视为某个共同体的共同财富，即个体并不是这些因素的所有者，而只是这些因素的看护者）。同时，他在罗尔斯工具性共同体和情感性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构成性共同体的观念，进而对此观念进行辩护。



邓正来教授对上述发言做了评论。他指出：其一，小南湖跨学科小组的讨论正是要集中阅读文本和作者的思想上面，最好不要将问题过度扩大，因为时间比较短，来不及把每个基本问题都做清晰的梳理。希望大家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讨论环节对主报告人的陈述有所回应，切勿变成自言自语。其二，主评论人孙国东的发言比主报告人沈映涵的发言更加清晰一些，但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个清晰上面。对于如此之大的两类理论，我们要注意各自理论具有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注意他们各自的观点和主张。罗尔斯与桑德尔所谈论的正义和自由可以诉诸康德、黑格尔以及柏拉图的思想脉络，其中各个概念是否有严格的对应性，还包括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张力，以及各自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有待进一步讨论。其三，关于宗教的，关于时代背景的，关于文化根基的很多非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知识，我们处于异国他乡是很难体会到，所以要对这些处于文字背后的繁复的知识性支援一定要重视，避免浮于表面或流于空谈。

接着,姚选民、沈国麟、陈媛、任崇彬、杜欢、龚智慧、王升平、谢亮、李新安等九位报告人依次做了八分钟发言。随后,大家就以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虚无主义与理性以及无知的关系是怎样的?正义的边界是怎样的?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区别是什么?正当和善何者优先?是否适用民法程序处理善的问题?社群主义存在的根基是什么?如何理解桑德尔论说中的主体概念?家庭和国家这两个共同体在中国有何特殊性?关于正当、正义、权利、善这些讨论是怎样内在于人类生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中国的变化是怎样的?罗尔斯和桑德尔理论的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性限度对于中国学者的理解意味着什么?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在场的听众和发言人表示了感谢,他做了简单的学术总结,提出关于下一次的读书会讨论方式的一些想法,希望大家能把读书和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

本次读书会是高研院举办的第三次跨学科读书会,学术讨论争辩激烈,前后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读书会分为报告评论和自由讨论两个环节:在报告评论环节,主报告人、主评论人和其他报告人依次发言,然后由邓正来教授点评;自由讨论环节,每位发言人都可以提问,主要针对的是主报告和主评论文章中涉及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倡积极的学术批判。

附阅读文本作者简介

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哲学家,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曾在2002-2005年期间任小布什政府生态伦理学总统顾问团成员。主要著作有:《公众哲学:政治道德论集》、《反完美的实情: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等。其中《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作为一部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名著,从道德主体、分配原则、社会契约等角度展开论述,指证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的偏颇,并据此提出了“正义内在于善”的思想,被西方学界视之为少数几部最有影响的挑战罗尔斯理论的力作之一,与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等并称于世,现已被译成八种文字在全球发行。

附“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简介

“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的前身是邓正来教授在原“六郎庄读书小组”的基础上于2003年在吉林大学创办的“小南湖读书小组报告会”,迄今在吉林大学已经良好运行了五年。其突出特点是:1.对学员进行跨学科的思想操练,同时引导学员避免阅读过程中习见的“作者死了”或“读者死了”的现象,提倡一种在理论脉络中解读经典而又保持读者自主性的阅读方式;2.由邓正来教授亲自主持和点评,设有严格的读书规则(每次设一名主报告,两名主评论,所有正式参与者都需提交书评文本);3.学员以高研院青年研究人员和国务学院部分博士生为骨干,同时对所有有兴趣的学友开放;4.每1-2年,从相关书评中择优辑录成书

出版（原书名为《知识与法律：“小南湖读书小组”文选》，已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3辑）。

复旦高研院第3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安排
(2010.1.10)

阅读文本: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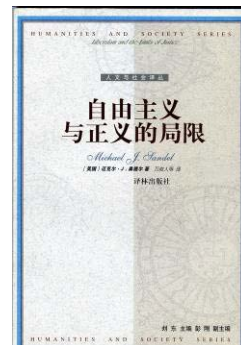
[美]迈克尔·J.桑德尔著 万俊人等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指导老师: 邓正来教授

主持人: 邓正来教授

报告顺序及内容(报告人以上交时间为序):



1.

主报告人: 沈映涵(国务学院博士后)(20分钟)

报告题目: 自由主义抑或社群主义?——评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内容提要:

桑德尔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而写作,桑德尔在此书中对罗尔斯的道义论自由主义及其所依赖的道德主体的独立性进行了充分的批驳。桑德尔由此主张以共同体作为构成性主体的组成部分,因而确立一种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本文将通过对罗尔斯理论的梳理,并对桑德尔所提出的对罗尔斯理论的质疑加以分析,进而指出桑德尔所主张的社群主义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2.

主评论人: 陈润华(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15分钟)

报告题目: “自由”理论杂谈

3.

主评论人: 孙国东(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15分钟)

报告题目: “构成性的共同体”?——评《自由主义抑或社群主义?》兼及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内容提要:

主报告这种面面俱到的论述不仅牺牲了一篇文章所应具有的主题性、逻辑性等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未能真正把握桑德尔写作此书的主要思路和研究路径,它不仅未能很好地把握桑德尔理论的内在理路,也未能把握其相对于罗尔斯的“知识增量”和理论限度。桑德尔采取了一种“批判性建构”的路径,在批判罗尔斯建基于自我优先于目的之上的“正当优先于善”命题的同时,揭示了“善内在于正当”的命题;在批判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基础上,论证了诉诸“构成性共同体”观念论证差别原则的必要性。

4.

报告人: 姚选民(国务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以下每人8分钟)

报告题目: 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读迈克尔·J.桑德尔著《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内容提要:

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并未能彻底否弃功利主义，桑德尔的共同体主义也不是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完全否弃。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存在缺陷，是因为桑德尔所理解之共同体太具体；而基于桑德尔的共同体主义的批判，罗尔斯在“罗尔斯的个人”概念上进行理论上的自我修正，则表明罗尔斯没有弄清楚其自由主义观点——“权利（正当）优先于善”的理论边界或基设。桑德尔的共同体主义是一种重生后的功利主义，是对小我功利主义的完全舍弃，是立足于不限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之自由主义的一种超越结果功利主义的规则功利主义。

5.

报告人：沈国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报告题目：破了“阿基米德点”又如何？——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内容提要：

桑德尔在本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根本问题是，权利是否优先于善。在他看来，罗尔斯对于“自我”也就是“主体”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先验的。指出了罗尔斯所谓的主体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桑德尔继而批判罗尔斯所谓的阿基米德点，即主体的“原初状态”：在无知之幕后，互无利益关涉的个体之间所享有的最高原则——正义（权利）。桑德尔也是从共同体的角度来批判这种“原初状态”的。桑德尔宣布了罗尔斯理论中主体的苍白、模棱两可性以及“原初状态”的不切实际性。但是破了罗尔斯的阿基米德点又如何？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的本质是由其所属共同体所决定，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把个人价值视为首要。桑德尔还没有论证，共同体的善是从哪里来的？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与个人权利之间有何关系？没有论证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社群主义只能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补充。事实上，在经验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以言论自由为例，西方对于言论自由的实践中总是存在着两种路径：以言论自由为目的；把言论自由作为工具和手段。这两种路径共同存在，缺一不可。桑德尔对言论自由的分析体现了他理论上不够彻底。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社群主义只有在作为以原子个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它的存在才具有实质意义。社群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健康的制约力量而有其存在价值。

6.

报告人：陈媛（国务学院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多样化选择：罗尔斯和桑德尔的归一性——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内容提要：

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部著作中明确申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与他在《局限》中的观点之争，关键在“权利是否优先于善”。在这场论战中，桑德尔集中火力首先批判罗尔斯的“个人理论”（或主体理论，或自我理论）——釜底抽薪，然后再证明，罗尔斯的个人理论不能支持他的正义理论——伤口上撒盐，由此形成了桑德尔的批判逻辑。桑德尔巧妙地借批判和证明，指出了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局限，得出罗尔斯仍属于道义论，但道义论不可能得出正义优先于善的结论，因此正义理论是占不住的，同时他鼓吹共同体主义，但他并没有阐明共同体是什么，何以可能。然而，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对这场论战产生新的认识。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阐述了一种身份认同理论。带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这种身份认同理论也许可以作为

一种有可能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全球理论,来破解西方人关于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价值之间的冲突和争吵。因为,罗桑之争的大前提改变了;多样性身份认同为人类新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进路;多样性身份认同所激发出来的人类多样性存在,也使人类多样性选择的优先性具有可能性,这样,罗桑的争论将失去意义,甚至在多样的优先性上,他们将握手言和。

7.

报告人:任崇彬(国务学院2007级硕士生)

报告题目:桑德尔对罗尔斯自我概念的批评——后形而上学时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

内容提要:

《正义论》的写作背景与问题意识;桑德尔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分析与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依赖于形而上学假定;罗尔斯的理论努力与桑德尔的批评所凸显的西方政治哲学问题意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根基的丧失与寻找

8.

报告人:杜欢(复旦大学政治学系2009级硕士生)

报告题目:一种中庸表象下的偏见——读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内容提要:

共同体主义或曰社群主义在二十世纪末期的兴起,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这种时代背景与理论的形成存在相应的关系。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无论是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复兴古典的自由主义,都对于社会现实失去了相当的理论解释力。而作为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和补充,共同体主义体现了一种现实的关怀。在本书中,桑德尔系统地对罗尔斯的道义论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从对“权利优先于善”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试图指出正义原则的局限性,进而论证自由主义本身的理论缺陷。但是,他在批评了所谓的自由与共同体之争后所提出的“第三种可能性”,在一种中庸式的理论表象下,存在着相当的偏见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于批判对象的界定与重构,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在理论上对于他所批判的自由主义的严重依赖。应当在认识这种偏见性的基础之上来看待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间的论争,并应当在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去理解这种理论论争背后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关怀。

9.

报告人:龚智慧(国务学院2009级硕士)

报告题目:正义与善之争中的“理性多元”假设及其限度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读书

报告

内容提要:

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理性多元的假设被认为是自明的,然而,理性多元在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与桑德尔那里,具有不同的指涉。对于罗尔斯来说,仅指善的理性多元,但对于桑德尔而言,按照罗尔斯构筑的正义对善的首要性的内在理路,不只是善,正义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是,无论是罗尔斯还是桑德尔,他们的理性多元论存在着限度,这种限度可以从激发“理性多元”这一提法的历史实在与理论背景中窥知,同时还可以从这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获悉。无论两人对正义与善的优先性作何种争论,这一争论本身可能遮蔽了某些更为重要

的东西。如果以这种哲学式的论争来指导政治制度的话,毋庸置疑,政治制度将会走向死胡同。

10.

报告人:王升平(国务学院2008级博士)

报告题目:罗尔斯、桑德尔思想中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从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视角来审视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判

内容提要:

罗尔斯的主体是一种个体优先的占有主体,罗尔斯由此确立起了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思维方式之所以具有相对主义倾向,是因为它确认了善的决断的私人化,导致善观念上的诸神之争。桑德尔批评了罗尔斯的主体观,主张一种交互式的构成性主体观,并在制度层面主张公民共和主义及公民的公共协商。然而,公共协商并不能摆脱相对主义的困扰:在桑德尔看来,公民是由历史和环境所构建而成的,这就可能导致公民的善观念本身也是历史性的——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他们的善观念也要发生变化。由这样一种流变性的主体的协商主体通过协商而达成共识而所得出的善观念,只是相对当前而言的善,而非永恒之善。桑德尔在《自由主义正义及其局限》一书中对罗尔斯理论的批判,是对罗尔斯认证过程的一种技术性批判,它没有触及罗尔斯思想中的虚无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桑德尔的公民共和主义并未从根本上超越自由主义。

11.

报告人:谢亮(国务学院2009级博士后)

报告题目:自我、主体间性与共同体:理解桑德尔与罗尔斯误会式论争的前提——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内容提要:

在对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桑德尔对罗尔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下述方面:正义的首要性、构成性与主体间或主体内的自我理论、正义内在于善、正义的分配原则及其道德基础。但在上述批判中,对于构成性自我与自我的主体间性的坚持应该是桑德尔批判罗尔斯的根本前提。对于桑、罗之间的争论也只有从把握共同体中自我与自我的主体间性关系之界定,才能明白这场争论是如何带有一种误会式论争之特点。同时,与其他援用了不同思想资源的社群主义者一样,迈克尔·桑德尔则借助于黑格尔的历史思想和后现象学的主体间性资源从较为抽象的哲学层面批判了罗尔斯。而且,我们还应看到在桑、罗的这场争论中,桑氏社群主义者的表象背后也与当下西方新共和主义思潮复兴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反动密切相关。而就其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建设而言,若未注意或可能的有意忽视桑、罗之争所特有的较为成熟的宪政社会前提,以及他们属于西方政治思潮纠结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这一内在历史逻辑的具体展开这一本质,而若单就其一作各取所需的论辩和采撷,就必将误入歧途。

12.

报告人:李新安(国务学院2008级博士生)

报告题目:主体的重构与困境——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内容提要:

桑德尔与罗尔斯问题之争的关键是:正义的道德主体的是否成立。罗尔斯从抽象的角度来设定无知之幕后建构正义的原则,它所界定的主体是剥离了特殊性

的人，最弱意义上的道德主体的人在协商中形成了共识；但是桑德尔从罗尔斯的结论出发来论证他的假设的主体的矛盾，进而对于正义论的基础形成了挑战。本文就是分析两者之间分歧的核心以及试图理清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设计的理想。

3.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二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2010年1月12日中午11:5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二期跨学科双周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学院副院长王德峰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王驰巍和郭富东应邀参加学术午餐会。本次学术午餐会由邓正来教授主持。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郭苏建、纳日碧力戈、林曦、刘清平、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学术午餐会。

邓正来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向王德峰教授以及他的研究生王驰巍和郭富东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为两位嘉宾简要介绍了高研院概况和各位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接着，向大家介绍了王教授的基本研究经历和学术成果。



主讲嘉宾王德峰教授感谢了高研院的这次邀请，表示非常高兴来到高研院和大家做交流，并围绕“复旦的精神”这一主题开始发言：



首先，王教授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假如社会机构的发展目标和组织形式全部按照康德所称的知性逻辑来安排，亦即在机构之中只有利润、效益和分配公正等因素起决定作用，没有其他目标与价值，则可以说这一机构进入了现代性。这在大学发展的状况上表现为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大学渐渐进入某种产业化趋势具有主导地位的境遇。

其次，王教授在回顾复旦校史的基础阐述了“复旦精神”。他认为，复旦最初的创办有明显的去政治化倾向，表现为既有从天下关怀出发的反潮流精神，也有敢为天下先的奋发精神。诚如复旦的老校歌中所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以及以学术和思想为立身之本是对复旦精神的最佳阐释。

再次，王教授追问“在大学中存在的类似功利主义的潮流中，复旦精神是否还存在”这一问题。他认为，今天的复旦面临着五大张力：学术独立与项目引导之间的张力，尊师重教与争位重产之间的张力，引领社会与适应社会之间的张力，天下关怀与排名关怀之间的张力，以西为鉴和以西为师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体现在大学精神凝聚和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等问题上；对此，王教授提出了“了解历史，借鉴西方，立足中国，自作主张”的看法。

接着，他继续追问“世界一流大学是否以西方标准为规定”这个问题。他认为，西方大部分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其国际性地位的前提是立足于各自民族文化，均有清晰而强烈的文化自觉，并锻造出了具有明确计划安排的学术研究体系。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学发展史上则普遍存在着把西方视为具有普世性的做法；然而，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但同时我们要批评地把我们

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强调：中国的文化、哲学、人生等态度需要拿出来，发现不足、承继精华，以帮助我们形成与西方之间的合适关系。

最后，王教授提出了“淡化资源竞争、强化学术独立、培养领导人才、坚持以学问进展来为社会服务”的想法，指出复旦已经走上了积极发展的道路，以坚守自己的传统精神来稳固历史形成的作为“南方文化精神中心”的历史地位。



嘉宾王驰巍博士指出：在现实中，不妨借鉴哲学精神中的批判理念，以完成综合性大学天下关怀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各个学科才可以更好地寻找到最为根本的共同点，进而可以紧密联系在一起。

考虑到大学的专业性和功能性之间存在张力，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目标问题将会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与会学者就知识理想、文化边界、学科分野、国学的定义、知识拷问的方式、学术风范的建立、行政化的优缺点、复旦精神中的小资情结、学者宣讲对大学精神凝聚的作用、学术权威色彩不断消退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主要包括：理念改革对现实改变有什么作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是否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部分明显不合理的评审制度设计应如何改变？“教授治校”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是什么？等等。



王教授一一详细回答了上述问题。他着重强调：第一，不可否认，复旦精神中的“小资情结”，尚有古典浪漫主义的影子，然而现在似乎变成了某种“白领情结”，重点关注的是以合理有用性和快速吸收为导向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和时尚文化。第二，复旦精神具体体现在复旦教授和学生之间打交道的活生生的事例中，这不是几个空洞的概念，其中有说不尽的掌故、传记与故事，需要大家认真阅读、用心体会。王教授用谢希德老校长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讲解物理学的亲身体会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复旦精神关系到复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牵涉极广，是一个不同忽视的大问题。

最后，邓正来教授感谢王德峰教授来到高研院与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座谈，并



对前述讨论做了小结。他指出：其一，王教授的这番话帮助大家厘清了思路，消除了误解，明确地告诉人们彼此共同面对的学校发展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老复旦人身上具有的高尚品格和学术理想。其二，每个机构如果能从自己做起，尽各自所能展开实际行动，履行学术责任，这或许是面临当下教育体制中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时一个较为可行的做法。其三，学术上的数量考评机制是与个人、机构的各种利益纠结在一起的，人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常常有一个减少矛盾、维护稳定的用意，肯定会产生许多问题。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同时可能还与我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发展史有关，其中层层叠加的诸多复杂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其四，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如何能进一步提升学术之心，并对学术研究有切实的帮助，进而才有可能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做成一个榜样出来。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的学术交流活动。每双周举办一次，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两到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用餐时其他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学术对话，促进复旦大学跨学科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4. 马戎教授主讲“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四）

2010年1月14日上午9: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四期由马戎教授担任座谈嘉宾，主题为“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马戎教授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加本次席明纳的学者还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刘欣，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张江华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朱剑峰。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他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宣布了席明纳的讨论规则和流程，并简要介绍了座谈嘉宾马戎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理论关注点。



接着，马戎教授做了四十分钟的发言。他指出中国的民族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必须正视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关联到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利益。



马戎教授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他追溯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他从民族、nation、“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m等最基本的概念谈起，指出政治学家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开始，这正是西欧国家构建民族的目的。与之相应的，“在西欧国家对外侵略的态势下，东欧、亚洲各国虽然国内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尚未发达起来，启蒙运动对这些国家的精英与民众的影响也有限，但是为了与西欧各国相抗衡，不得不对本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一被动效仿逐渐形成了“民族”的第二种模式。

第二，马戎教授回忆了俄国和苏联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他指出，沙皇俄国曾努力构建“俄罗斯民族-国家”，而十月革命时期，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革命的需要，采取了鼓励各部族“民族独立”的战略，其后斯大林提出了将苏联建成为一个“民族联合体”的战略。

第三，马戎教授概述了中国民族现象产生的历史与现今最突出的问题。他认为，清朝末年，西方各国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鼓励清朝下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同时，该朝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基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也逐渐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进行“民族理论”和国家构建，在“民族”概念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双层结构，即上层是“中华民族”，下层是56个“民族”。

马教授详细讲解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培养、体现及大方向，并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正在于“1949 年建国后，承袭自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定义）和类似苏联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使得新中国没有完成 20 世纪初开启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而是在中国进行了‘民族识别’，客观上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多民族联合体’。此外，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许多重大项目“吸引了许多东部和中部的汉族劳动力来到西部，也在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使得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四，马戎教授分析了在新世纪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今后可能的出路，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建议。其“文化化”的要义是：一方面承认全体国民共同的核心认同（identity）是“民族”而不是“族群”；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邓正来教授指出，马戎教授的演讲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关于中国中华民族文化化的建议以及区分区域和民族界限的想法等等。

在第一轮讨论中，在场的学者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避免感情符号和政治符号



的冲突？如何避免去政治化本身的政治化？中华民族历史融合本身就有一个文化化的过程，民族凝聚中的强烈的文化支撑有很多的政治因素，这其中的界限如何能够更加清晰以使得各民族不产生反感？各民族之间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达到？在后毛泽东时代如何寻找一个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是否可以考虑通过政治认同来促进文化认同的思路？以共同的宪法选择为基础建立认同，通过政治结构进行公民化的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这条道路是否可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用很大，当今民族问题是否是汉族“去汉化”本身导致的问题呢？概念常常是被建构出来的，但随着其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文化和民族概念也是如此，那么如何使得文化研究更具开放性，而不是破坏了某些文化中的独特而精深的部分？如何能够更好地考察每个民族在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特殊性？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的淡化对我们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有什么影响和帮助？民族退出机制有何合理性？等等。

马戎教授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两千多年延续的中国历史，反映在以二十四史的脉络一统而下的话语体系当中，诸如 nationality、ethnicity、ethnic groups 等概念的简单照搬都不完全符合对中国民族的指称，用与之对应的理念和思路来看待中国的民族关系与现实情况有很大张力。眼下最重要的是：依靠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关注重点，找出更多也更加根本的共同性，以使得 13 亿多中国群体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所谓“保皇派”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虚君共和”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接受能力和政治认同感，有其历史借鉴和启发意义。



第三，针对苏联的民族问题，马教授指出带有革命性质的民主诉求往往会把民族主义当作同盟军，这是很重要的，分析理论问题不可以忽略这一点。

第四，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主脉是延续的，出现的只是皇帝家族族名的改变，其中不变的是各族均以礼教的获得与尊持作为区分华夷的基础性标准。今天，选用文化差异的价值体系观点来看民族差异这一视角，有利于缓解纷繁的政治张力。

第五，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以民族来命名，以民族聚居地来划定边界，其表现出来的整合力对于社会良性运行十分必要。现时期，更需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民族区域自治，淡化民族边界，淡化并优化以族群为单元的优惠政策，追寻每一个公民之间的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第六，民族和国家的基本认同原则是公认的，不仅仅以语言和习俗为界限，另一方面；民族架构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并非一以贯之的。

第七，人的认同体系有许多层次，但民族问题的核心认同是中华民族，目标是在国际竞争中团结起来，应对危机。但这些年的民族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整体民族认同感减弱，这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民族压迫和剥削是要被消除的，民族融合是好的发展态势。

邓正来教授做了小结，他指出：第一，我们需要注意就目前而言，民族问题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西风东渐、国门打开之后，基础性设施如此之便利，少数民族与外部交流如此之频繁，前所未有；还有，国际上的民族国家制度建构日趋稳固，民族自觉、独立、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了合法性，意识形态的架构也发生了变化等等。第二，大家的讨论较为“封闭”，均是在策略意义上的讨论，遵照的是“历史版图主义”的讨论模式，也即假设了某一个固定的不被质疑的前提，但这会使我们看不到另外的可能性，失去了更大的历史担当。知识不能简单地受制于某种时尚，也不能局限于完全相似的问题意识。

接着，学者们又围绕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如下问题：国内民族情绪是否处在一个极端的上升时期？是否会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出现的可能？清朝末年的政治整合与传统中国固有的文化同化有何区别？以省来区分人群是否和以民族来区分人群一样，都具有同样的歧视性？等等。



马戎教授又做了回应。他指出：其一，对民族主义的引导应当反思民族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寻找团结各个民族的方法，以理性的方法对待不当的思潮，仅仅通过财政和技术的手段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其二，儒家传统下的“华夷之辨”不是种族之辨，这表现在宗主对藩属有很大的义务，区别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而清朝末年的政治整合，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和内部矛盾无比复杂，是在帝国主义船坚炮立逼迫下的变革，并非只采取了“移民实边”这一项政策。其三，所谓少数民族小偷的问题因为语言不通、饮食不同等变得很复杂，这里面有文化和城市的差别，需要分析研究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例如可以从政治分层和族群分层等理论，借鉴美国学者研究

黑人和白人的生活状况所采取的方法，来追踪、调查、分析各民族之间不同的居住状况、专业结构、收入、地位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再次感谢了座谈嘉宾马戎教授和其他诸位嘉宾以及到场听众朋友们。

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刘清平、吴冠军、刘清平、孙国东、陈润华、林曦、沈映涵等作为与会学者参加了本次席明纳，并都做了发言。

附座谈嘉宾简介：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关系研究、西藏问题研究、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主要论著有：《西藏的人口与社会》（1996）、《民族与社会发展》（2001）、《社会学的应用研究》（2002）、《民族社会学》（2004）等。

5. 复旦高研院“奉贤通识系列讲座”顺利开讲一学期

复旦高研院参与中学通识教育

“奉贤通识系列讲座”顺利开讲一学期

2010年1月8日，随着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主讲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思考》落下帷幕，由高研院和奉贤中学联合主办的“奉贤通识系列讲座”已经顺利开讲一学期。一学期以来，该讲座先后邀请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秘书长桑玉成教授、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李承少将、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先生、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秘书长桑玉成教授和郭苏建教授为奉贤中学师生带去了八场精彩讲座，赢得该校师生的广泛好评。



由高研院与奉贤中学合作创办的“奉贤通识系列讲座”旨在以通识教育的新模式解决大学与高中知识链和教育链断裂的问题，进而引导教育体制真正回归教育与学术，为国家培养真正具有扎实学术功底的学术后备人才。正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在该系列讲座的开坛仪式上指

出的那样，高研院之所以愿意同一所高中开展通识教育的合作，乃是基于下述考虑：第一，旨在推进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教育改革试验，引导教育体制真正回归教育与学术。利用大学资源在高中开展通识教育既是对“应试导向”的高中教育体制与“求职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制度化挑战，更是探索大学与高中良性互动关系的创新性、革命性探索。第二，这种创新性、革命性探索既是以通识教育的新模式解决大学与高中知识链和教育链断裂的问题，也旨在为国家培养真正具有扎实学术功底的学术后备人才。由于将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完全隔离开来，仅在高等教育阶段推行的主流“通识教育”模式不仅客观上不能解决目前严重存在的大学与高中知识链和教育链断裂问题，而且最终也不利于大学通识教育目标

的实现。目前,大学教授不愿意进高中讲学、高中教师也进不了大学讲坛。这种大学与高中师资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要为大学与高中知识链和教育链的断裂承担相当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讲,将教育视为一种分阶段的整体性实践并利用大学资源在高中开展通识教育,不仅是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的创新性尝试,更有利于真正培养通识性学术人才,并最终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



为了将该讲座打造成中学教育中的品牌性通识讲堂,高研院在听取部分学术委员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高中生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需求,专门为其设计了兼顾文史哲和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的讲座方案。为此,半年来,高研院专门邀请邓正来、桑玉成、李承、黄玉峰、王德峰、朱维铮和郭苏建等著名学者、专家为奉贤中学师生带来了八场涉及多学科知识的讲座。这些学者、专家或为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或为治学严谨、有口皆碑的史学大师,或为深味中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政治学家,或为有着充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军事学家,或为有着丰富大学哲学教学经验的“哲学王子”,或为有着丰富中学教学经验的“中国语文教学的‘叛徒’”,或为对中国和西方发展模式皆有深切理解的“海归教授”。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专家轮流登场,为奉贤中学师生带来了一场场值得他们细细咀嚼的精神盛宴。



据悉,该讲座面向的对象为奉贤中学全体高一师生。每次讲座历时一个半小时;其中,主讲人主讲一小时,同时专门留下半个小时与中学生互动。半年来,奉贤中学师生们均对讲座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人们普遍认为,让那些只有在著名学府才能聆听其教诲的著名学者走进中学讲堂,走进刚刚迈入高中门槛的中学生,既让他们

提前领略到了学术大师的风采,也让他们学习到了书本以外的各种研究视角和理论知识,更让他们增强了考进名校、与大师为伴、献身学术事业的信心。

附:讲座相关信息

第一期:时间:2009年9月25日

主讲人: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读书,由心出发的使命感



第二期：时间：2009 年 9 月 25 日

主讲人：桑玉成教授（上海社联党组副书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政治学会会长）

主讲题目：有一种生活叫政治生活



第三期：时间：2009 年 10 月 30 日

主讲人：李承教授（少将军衔，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治学会副会长）

主讲题目：军人、军队、军衔



第四期：时间：2009 年 11 月 20 日

主讲人：黄玉峰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复旦高研院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高中生要会读书



第五期：时间：2009 年 11 月 27 日

主讲人：王德峰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人文典籍与人生



第六期：时间：2009年12月11日

主讲人：朱维铮教授（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原主任）

主讲题目：中国、中国人、中国史



第七期：时间：2009年12月25日

主讲人：桑玉成教授（上海社联党组书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政治学会会长）

主讲题目：人类的政治智慧



第八期：时间：2010年1月8日

主讲人：郭苏建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s* 主编）

主讲题目：后金融危机时代——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思考



三. 媒体报道

1. 学术研究的新典范——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2010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11 月 8 日，值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集十余年之力所完成的哈耶克研究成果(《哈耶克社会理论》、《哈耶克法律哲学》)之际，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邓正来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上海市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哈耶克理论及邓正来教授的哈耶克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现摘录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学术是个体的还是运动的？

■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感谢各位老朋友周末前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感谢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和复旦大学出版社为筹备这次研讨会付出的努力，感谢复旦出版社贺圣遂、孙晶和陈军等诸君为拙作的出版付出的辛劳！我之所以出版《哈耶克社会理论》和《哈耶克法律哲学》这两本论著，主要有三个目的：

首先，从个人思想操练层面来看，是对自己 1994 年以来哈耶克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自 94 年来，我翻译了 220 万字，写了这两本论著所收录的数十万字论文；此外，70 万字的《哈耶克读本》也将于近期推出。所有这些论著的出版都集中反映了我十余年来进行哈耶克研究的成果。

其次，从理论上讲，哈耶克的思想中还有很多重要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第一，哈耶克的无知观、有限理性论等与传统或地方性的 momos 的关系问题。其所开放出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理性是否足以摆脱产生这种理性的各种条件？外在于这些条件对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否可能？等等。第二，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建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政治经济秩序建构本身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即自由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当然，还涉及到一个值得深究的哲学问题，即知识的性质问题：知识究竟是力量、权力，还是生产力？知识是否具有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的力量，即赋予某种社会性质以正当性？我们究竟是在做世界，还是在想世界？这两者的关系为何？等等。

最后，从知识产生的角度来看，这两本书以及《哈耶克读本》都不仅体现了一种个体化的学术研究方式，也体现了我一贯提倡的“个殊化进路”，即在践履一种研究性阅读与研究性批判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进入大师思想和开放出“问

题束”的方式或者方法。因此，也可以说，它们的出版乃是对当下主流的、以集体运动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状况的一种批判。

浅说邓正来二书

■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学历史的，读了邓著二书，没有资格从社会理论或法律哲学方面说三道四，只能就古近中国人怎样看待“自由”，讲点感受。



古汉语里自、由二字互训，联成一词似初见于唐修《隋书》。其中描述隋文帝的鲜卑族皇后“奇妬”，闻知文帝私幸一名美人，就将她暗杀，惧内的文帝大怒，单骑出宫窜进山谷，然后对追及的大臣哀叹：“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那以后列朝的诗歌小说，便常用“自由”一词，形容率意径行的举止。

晚清改革思潮的推动者都好讲“自由”，尤其是在西书中译层出之后，表明他们的“自却由”理念已接受西方诠释。例如首先全译穆勒《自由论》的严复，便称中国人视自由为“放诞、恣睢、无忌惮”，均属“劣义”，因而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以示与传统观念划清界限。在戊戌新政被慈禧集团绞杀后，在国外办刊作文不断抨击清廷腐败的梁启超，一度醉心于英美的人权自由，在《新民说》、《饮冰室自由书》中，连篇累牍宣传唯有实现政经财文的全面自由，中国才能得救。这招致他的导师康有为憎恶，连连致函予以痛斥，说他背弃了以吁求清廷用立宪消弭革命的既定方针。当然，无论严复、梁启超，还是鼓吹排满革命的章太炎、邹容等，对欧美“自由”观，各有所尊，诠释混乱，衡量尺度有斯宾塞、穆勒、卢梭等等式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从清末到民初，乃至延续到上个世纪，中国学界对于“自由”理念，鲜有学理与历史相结合的非功利性考察。我们曾经奉“反对自由主义”为主臬，但反思“自由主义”的经典指示，却不能不说那是隋文帝式关于“自由”界定的新诠。

因而，忝居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从业者，我初见邓正来教授翻译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就深感兴味，以为有助于厘清古近中国人关于“自由”的形同实异的历史理解，那以后结识邓先生，越熟悉越为他不计眼前功利，潜心研究哈耶克和西方自由主义来龙去脉的风格所折服。我在复旦从教已近五十年，如孟子所云总为“人之患”，也如梁启超所云“务广而荒”，于是很钦羡为学问而学问的专家。邓正来先生多年如一日，从原初文本的翻译出发，由译而介，进而针对近现代中国学界好谈西方自由主义，却不明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及其历史为何物的现状，著成《哈耶克社会理论》、《哈耶克法律哲学》两部大著，令我读后深感吃惊，以为这才堪称“西学东渐”的研究典范。

近年我特别希望中国未来学子，重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课题研究，但愿邓正来教授的这两本书，可成这方面历史研究的楷模。

社会主义者也应该重视哈耶克

■童世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这里想说的是,不仅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有特殊兴趣的人们应该重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有特殊兴趣的人们,也应该重视哈耶克的理论立场和学术研究。在当今世界,真正要做一个踏实的开明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对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尖锐批评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确实,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从来也没有因为哈耶克的工作而偃旗息鼓。1944年,哈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最尖锐也最出名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出版的那年,卡尔·波兰尼的同样尖锐批判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著作《大转型》也同时出版,并且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经典。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与他分享这一奖项的恰恰是他所激烈反对的福利国家政策的最重要的理论辩护者之一奎纳尔·缪尔达尔。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去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似乎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失效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据,而且甚至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对放松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是一大错误,但欧洲多数选民们却并没有把多数选票投向更重视市场监管和公共福利的中左翼政党,法国、德国甚至丹麦这样的国家,偏向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党派依然执掌大权。其间的道理,相信通过对哈耶克的深入研究会有所明了。

因此,对于左翼或社会主义者来说,一方面确实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全球气候变暖这些任何社会理论家都不应该回避的重大现象,都是在哈耶克完成其主要著作之后出现的;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哈耶克尽毕生之力所论证的有关人类知识、人类行动、社会秩序而不仅仅是经济系统的诸多观点,是我们在思考知识与无知的关系、行动与思想的关系、秩序与自由的关系等等问题的时候,有必要高度重视的思想资源。

自由的难题:从生命存在到社会存在

■林尚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在现代学术空间中,论及自由,都绕不过哈耶克;在中国的学术中,论及哈耶克,都绕不过邓正来。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这个勾连,也是颇有意义的学术现象。解释这种现象的答案,可能只能从邓正来教授最近出版的两本研究哈耶克的著作中才能找到。

关于哈耶克,我没有研究多少,但对自由,我一直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因为,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人如何彻底摆脱异化,成为完全的自由人展开的。如果说马克思是在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层面上关注自由,那么哈耶克则是在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上关注自由。

我们对于自由的认识和把握,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从作为生命意义存在的自由;二是从作为社会意义存在的自由。从前者出发,我们必须回答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从后者出发,我们必须回答社会从何而来,社会应往何处。这两个层面的回答是相互关联的,既需要哲学高度的终极关怀;也需要现实维度的制度与政策设计。也许仅仅从一个维度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要容易一些,但同时从这两个维度进入,并相互呼应,表里结合,那就困难许多。哈耶克理论的功能和

魅力所在就是能够同时将这两个维度的分析融为一体,从而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既能触及个体的心灵,也能够触及社会制度的本质,其可能产生的效应与影响之大,自然可以理解。

研究与阐发思想家的思想,在于很好地呈现思想本身。然而,这种呈现实际上已不完全是思想家本身的思想,更多的是研究者基于自己理解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家的思想。因此,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在关注哈耶克在想什么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本书作者在想什么。

从邓正来的为学想到三个“不等于”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从老邓的为学中,我想到三个“不等式”:

首先,无学历不等于无学问。大家今日若不是能混个博士、博士后头衔,想要在重点高校里待着,那是天方夜谭。而老邓不同,他无学历,却居然先后由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给予殊荣。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很有启发;除了表明老邓是个“怪才”外,它告诫我们,“学位大跃进”不见得有助于高水平学者的培养。

其次,研究自由主义思想不等于自由主义。我粗糙地把老邓的“学术生涯”分三段看。第一段,他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召集过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研究。第二段,老邓致力于社会理论研究,在此阶段中,他直接或间接地触及法国与德国的当代社会学思想,尤其是布迪厄与哈贝马斯的知识社会学给过他不少启发。第三段,老邓致力于众所周知的哈耶克研究。老邓这些年走过的“三条道路”相互之间不免是有矛盾的,但恰是这种矛盾有其自身的说明性价值。对我而言,这个矛盾的事实表明:研究自由主义思想不等于自由主义。

第三,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不能等于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在人类学讨论得比较多,不局限于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而更多地是与社会理论关联起来。比如,法国年鉴派传人杜蒙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另外,西方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入世的,因为是入世的,所以也是社会的。就此而言,对于哈耶克进行批判性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找到自己的位子及适合于解释中国的理论。

“哈耶克问题”到底是什么?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

我这里先提这样一个问题:“哈耶克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社会,以及自由社会如何生成的,它的基础是什么,这才是哈耶克要向世人说明的真正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哈耶克问题”若是有的,可能不是“自发社会秩序”,而是自由,是自由的制度保障,即如何实现和确保自由。这才是他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的真正理论指向,且事实上他的整本书以及后来的《法、立法与自由》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和确保自由而展开的。

第二,我不是很同意正来兄把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译成《自由秩序原理》。尽管哈耶克讲了许多自发秩序,但这本书的最核心的关键词是

“liberty”，而不是“order”。哈耶克一向对用词特别讲究，总是反复考虑推敲。如果他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不直接用“The Principle of liberal order”呢！并且就我记忆，哈耶克很少用“liberal order”这个词。真正从词源上来追溯，“constitution”恰恰相当于我们西周和先秦时期文献中的“宪章”“章典”和“制度”的含义。从一点上来看，哈耶克写作“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恰恰要讲的是自由制度基础与制度条件，或要传达法治和宪政民主政制下才有个人自由这样一种自由社会的基本理念。

第三，邓正来教授在几篇文章里都提到，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是建立在规则系统之上，惟有在规则基础上，才能组织自发社会秩序。如果说自发社会秩序的确有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照哈耶克看来，就是抽象规则或规则系统。但抽象规则和规则系统又从何而来？是人为建构和制定的，还是演化生成的？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一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至少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实际上，哈耶克在对法律的起源问题上也有很多困惑，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花时间去深究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强调，尽管哈耶克的理论中有许多问题，但这绝对否定不了哈耶克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理解了哈耶克在当代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就理解了把哈耶克思想引介到中国大陆社会的中国思想家邓正来教授的地位了。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理对发育公民社会的意义

■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社会分子学角度来看，以分、制、禁、官、君这五要素为基础聚结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构成模式。只要我们认识到异质多元社会与同质一统社会的结构区别，我们就会自觉地克制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我们的教条的习惯冲动，我们就会理性地意识到，当我们的社会并不具备异质多元个体社会结构时，我们就不应该教条地套用自由主义原则来作为当下改革的指导方针，同时，我们也不必如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那样，以简单的泛道德主义激情来理解自由主义。

在现代化造成了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今天，哈耶克思想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只有发育公民社会，才能有效地整合由改革开放与市场化发展而形成的无数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个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文明。

在此，我还想提到我们要防止国家主义的回潮，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由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失败，在西方也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例如索罗斯就是如此，因而在一些国人中，又会从对西方思想的教条式的崇拜与理解中，得出这样一个国家主义的结论。似乎我们也应该来一个“国进民退”，似乎国家对经济的行政性的权威控制，可以取代市场本身的作用。这就又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中国正处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转型时代，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我们民族走向文明进步的新阶段的必由之路，处于这一阶段，我们既要反对把自由主

义教条化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原则，避免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陷入“一放就灵”的陷阱，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左的国家主义的回潮。中国只有在国家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才能找到从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的平衡点。

哈耶克思想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郭苏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

邓正来教授引进和研究哈耶克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以下两点实践意义。一、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受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理论学派的影响，因而，虽然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并没有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则突破了原有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邓教授当时对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和研究对其间经济改革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简单地贴上“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标签。二、近些年来，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在批评计划经济的弊端和推进市场改革方面无疑是切中时弊，其分析工具也是有效的，但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性，过分迷信市场的作用，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市场会失灵、市场有弊端、市场会有害，政府的适当干预和调节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由此就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崇尚经济国家主义。我们不能忽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现代化成就并不是在不断强化国家的作用和不断集权化中取得的，恰恰相反，是在不断分权、下放权力、不断市场化中取得的。经济自由主义不是“万灵药”，经济国家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重要的是在两者之间如何取舍、如何平衡、如何整合各自的优势，趋利除弊，不断创新。

直面无知才是人的成熟状态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哈耶克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他主张所谓“自生自发秩序”，而反对一切人为的计划设计。但这种惯常的理解是极为粗糙的，是一种教条。哈耶克提出“计划”与“自发”的二分概念，并不是在鼓吹二元对立，也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否则他对中央银行的、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这一点在正来先生的论述中有明确的强调。如果将哈耶克做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那我们反而会错失他真正的洞见。

哈耶克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包含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的反思性品格。哈耶克不至于天真到要去改变人的意识活动结构。他敏锐地洞察到，正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人们才要防止对它的滥用，因为人的“必然无知”也同样内在于实践活动。因此，计划必须受到“无知”的制约，否则，将会事与愿违地走向灾难。所以说，他并不是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有意图的设计活动，而是那种“理性的自负”，那种妄想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的计划方案。

康德曾指出，人的不成熟状态是自己放弃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这当然是深刻的见解。而哈耶克揭示了另一种“不成熟状态”，那就是妄想通过理性彻底

征服无知。在我看来，这种幼稚的幻想可能不是出于“自负”，而是企图获得全知来达到绝对的确定性，以此克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人的成熟状态应该是：直面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自然乃功成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哈耶克身上有一种在“一战”后欧洲中产阶级大众社会中已颇为罕见的老派的或曰成熟的智慧，这种老派的智慧不怎么相信“有意人为”，而更相信自然或历史的“无意而为”。邓正来先生将哈耶克的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译作《自由秩序原理》，而不是用人为性的和制度性的“宪章”一词来译 constitution，意在更贴近哈耶克思想的这一核心。Constitution，很难找到一个非常贴合的中文对应词，译“宪章”或“政体”，却有强烈的人为建构的意味。哈耶克的想法是，真正可称为“自由”的 Constitution，当主要在历史中自然而成，非人为、刻意、理性的建构。这正如希腊城邦所谓“政体”，与其说是一种“制度”，毋宁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这也表明，即便是依据自由主义原则的有意的、人为的制度建构，在哈耶克看来，也不见得符合“自由原理”。哈耶克的一句名言是：“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异端与正统教条有时在本质上反倒是一致的。

作为一种学术典范的邓氏翻译——研究

■姚中秋(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

邓正来教授对哈耶克思想在中文世界、在大陆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说，这两本文集代表了大陆、乃至整个中文世界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最高水平。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邓正来先生深入到了哈耶克思想的最深层。他把哈耶克思想的核心逻辑揭示了出来，也许其中某些逻辑的链条式哈耶克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的。

邓正来先生开创的这种研究－翻译合一进路，树立了引入西方学术著作的典范。当代中国学术界不可能不引进西方思想、学术，但是，究竟如何引入？是为了引入而引入，还是通过研究的方式引入？我相信，唯有以研究为导向的翻译，才能够使得译者超越原著，以原著为出发点，实现学术创新，把西方学术内化于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创造性生产过程中，而不只是充当外国学者的单纯介绍者。

能不能从理性的有限推论出正当的自由？

■刘清平(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对于当前热闹而浮躁、膨胀而虚华的中国学界来说，邓正来教授的哈耶克研究的首要启示在于：只有通过文本的细致解读乃至逐句译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在理路中去，才有可能得出真正有学术意义的成果。也正是凭借这种冷静而严谨、凝练而扎实的研究，邓正来教授能够拨开某些西方学者对哈耶克的保守主义解释和效益主义解释的迷雾，指出他在哲学上陷入休谟非理性主义与康德理性主

义之间的理论困境。我认为，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哈耶克思想的实质和悖论提供了一个精准的切入点。

其实，尽管哈耶克自以为受休谟影响很大，其立场却更接近康德，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康德依然有“理性的自负”，哈耶克却要否定“理性的自负”。于是，哈耶克仍旧无法摆脱休谟甩给我们的那道难题：能不能以理性的有限性以及自生自发秩序的“事实”为基础，推导出站得住脚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他强调的那些源于自生传统和自发习俗的“规则”，怎样保证不该受到有限之“知”掌控的自由不会沦为一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怎样保证凭借这种自由建立的文明秩序不是一种自生自发地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以智诈愚、以上压下的文明秩序，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文明秩序？有鉴于此，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批判性地反思他那套在中国颇受膜拜的自由主义理论。说到底，如果哈耶克的预设能够成立（我认为可以成立），那他凭借自己的理性建构的自由主义理论一定也是有限的。

理性设计·自发秩序·中国问题

■吴炫（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邓正来的著作引发我的三点思考：其一，哈耶克针对西方“由少数人的理性设计”所做的批判、以及对人们遵从的“自生自发的秩序”的重视，启发我们将儒家精英的“教化传统”与民间自发形成的习俗传统做分离思考，并将这种分离产生的张力作为中国现代制度的整一性来对待，调整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制度建立之模式。其二，相对于儒家的长期教化对中国民众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内部规则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依附西方设计”之堕性，中国式的现代自由理论与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同样不能放弃由少数人的创造性理性设计之努力。因此强调“创造性设计”，是中国现代理性建设需要突破“生生、依附、承传”的文化传统的时代要求使然，这个问题使得我们需要与哈耶克的批判对象“反着来”。其三，吸取哈耶克的“理性批判——独特问题——观念生产”的批判范式，可能是包括邓正来教授在内的中国学者改变单纯的阐释西方理论的“理论要求”。即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不单纯是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重要的是以中国问题的提出反观制约我们的现有理论之局限、从而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自由观念，然后才可能进一步生成与此相适应的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终端。相对于这个目标，我们可能才刚刚从“理论研究之路”踏上“理论之路”。

哈耶克的“真问题”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邓正来先生之所以持续十几年翻译和研究哈耶克，是因为在他看来，哈耶克对“秩序”、“规则”和“法律”关系的讨论，是处理了一个真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是一个真问题，是因为所有思考人类应该拥有怎样一种“良序社会”的思想家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不过不同的思想家因为参照系不一样而有所选择和区别，并且导致了不同的方案。譬如洛克和卢梭对“财产权”的态度就不一样，尽管他们分享了“布尔乔亚”的前提；而另一个方面，则是对于在形成“秩序”、

造成“规则”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理性”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或者“非理性”又有什么样的作用，也同样有着完全不同的方案和看法。

邓正来先生的两本大书正是通过对哈耶克的研究逼近了这样的大问题，其中不难发现艰苦思考的印记，其现实意义也不言而喻，因为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同样是往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一个“良序社会”？

什么是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

■苏振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理解哈耶克，一个进路是不妨从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入手。但对个人主义本身也有很多的误读，邓正来先生的《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一文，完整地澄清了这个问题。

关于个人主义，有三点可以在邓先生的文章的基础上谈一谈。其一，为什么哈耶克认为整体主义其实是政治专制主义？其二，哈耶克指出，一种将个体与其他个体割裂开来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的实质也是政治专制主义。其三，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强调的是普遍联系之下的个人主义，人皆生活在社会之中，不能够脱离社会而存在，必须尊重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规则，也就是法治秩序。据此，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是站在哈耶克的对立面的。今天，如果说存在一种如吴敬琏先生所批评的“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情形的思想基础乃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这恰恰是哈耶克反对的。

探究内生秩序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1989 年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此年，冷战的框架历经多年后开始走向瓦解；同年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历史已终结于西方式自由民主。这一宣称以及相关的理念迅速形成为一股思潮，并经“喧嚣的九十年代”，一路发展到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而达到顶峰。这一发展的背后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理念：一是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其二是认为西方式民主放诸四海而皆准。然而，这两个根本性的理念及与之相伴随所设计的制度、政策，在实践层面上遭遇了严重的挫败，其谬误的显现已经相当充分了。事实证明，采用西方式的一套自由民主，解决不了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

以上的种种，看似跟哈耶克思想没有关系，其实不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哈氏所批判的“理性设计”的傲慢和谬误，以及他所称“自生自发秩序”的根本重要性。这一思想的要点，是任何一种秩序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理路，从而形成社会运作的规则。要在原有秩序的基础上进行改变，必须考虑该社会本来的秩序和规则，而不能置之不顾，顺之事半功倍，违逆则事倍功半，这与渐进改良的智慧若合符节。

链接地址：http://dszb.whdszb.com/bl/201001/t20100104_2579444.htm